

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

施由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宋代以来,江西的诉讼之风一直较为盛行。清代时,江西的诉讼案呈现宗族化倾向,而且新的特点是借助宗族公产为诉讼的资金,结果加剧了清代江西的诉讼之风。江西地方政府和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遏制这类风气,且起过一定作用,但诉讼之风依然日益严重。虽然如此,宗族之情对清代江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对照当今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引导农村宗族活动,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代;江西;争讼;地方政府;宗族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6-0126-08

Research on the Clan's Solutions to the Phenomenon of Jiangxi People Adept in Lawsuit in Qing Dynasty

SHI You-ming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06)

Abstract: From Song Dynasty, Jiangxi people was famous for adept in lawsuit. In Qing Dynasty, Jiangxi's grass-roots society was more familiarization than before, and the new character of Jiangxi people's adept in lawsuit was funded by the clan's public property. So, the number of lawsuits was more than past dynasties. The Jiangxi government and clan tried to control this phenomenon, but can't get rid of it. The cl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society order of Jiangxi. At present, how to lead the clan's activitie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Key words: Qing Dynasty; Jiangxi; adept in lawsuit; local government; Clan

江西自宋代以来就是一个讼风较重之区,即诉讼官司频繁之区。究其原因颇多,一以贯之的原因主要有从宋至清江西都是文化名区,民众重教育,读书人多,虽然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但大多数江西读书人仍然未能学而优则仕,除从事教师(如塾师)和医者外,相当一部分人成了“讼师”,以帮人诉讼为业,从而江西地域讼案多,此外,江西山多的地理环境使得赣鄱地域的人性格“伉健”,争胜好斗,也是形成自宋至清江西讼案多的一以贯之的原因。

到清代,人多田少,地权争夺加剧,田土官司多,加之清代江西基层社会已宗族化^①,聚族而居,族皆有祠堂,并置有祠产(族中公产),祠产成讼资,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这是清代的时代特点。

【收稿日期】2022-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19BZS136)

【作者简介】施由明(196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① 可参见施由明:《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一、从宋代至清代江西的争讼之风

早在北宋时期,著名文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①南宋著名文人陆游在《南唐书》中也写道:“庐陵民尚气喜讼,以先止为怯,素号难治。”庐陵即今赣中地带的吉安地域^②。

从宋代直至清代,江西人好讼、喜讼的习俗不变,且越演越烈,元代的判案书、明代江西文人文集、清代的地方志中有着很多江西人喜争讼的记载^③。明代江西著名学者罗洪先就曾写道:江西“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④明代江西著名地理学家邓元锡也提到江西“君子尚名,小人尚气,颇多讼,称难治”^⑤。清代江西官方政书及江西方志中关于江西各地域人争讼的记载很多。如雍正年间曾在江西任按察使的凌燾在其所编政书《西江视臬记事》中的《刁讼拖累完粮积弊临春夺耕议详》一文中谈到:“江右民俗刁悍,好讼喜争,以小事架大题,以风影为实事,任意织罗,牵累无辜,及至准理票拘,不遵投审,或藏匿要证,或临审自逃,经年累月,案悬莫结,被告枉罹牵累,守候无期,而彼则拽尾曳掄,自逞得计,蚩蚩愚氓,何堪陷累。”^⑥

清代江西的地方志中,多有争讼之风的记载,如光绪《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记载万安县:“县旧吴楚之交,人多庞古,率皆寿考,衣冠所萃,艺文儒术风轨不凡,王文成公讲学虔南,邹文壮公大其传云:洲从事者三十余人。彬彬乎理学之盛!然民俗尚气健讼喜斗,近复乡饮之举,渐次慕义。”^⑦同治《南康府志》则记载建昌(今永修县)、安义两县:“建昌、安义在郡西南,地势丰厚,山水半焉。大都地峻则气郁,民生多质朴峭直,果于赴义而饬廉耻为风节,地平则气宣,民生多发扬负气,勇于争斗,而以健讼为愉快。”^⑧同治《南安府志》记载南安府四县:“冠行古礼,宾宴齿序皆古之遗风,何乃以气劲义弱,喜讦讼,惑祷祠。”^⑨

这三府之地都是理学过化之地,南安是宋代儒家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著书立说与宣讲理学之地,南康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经为官并通过书院教育弘传理学之地,吉安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曾为官并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之地,但恰恰在这样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积淀之地,却是讼风严重之区。

实际上,江西许多地方皆如此,如省府南昌:“俗多争讼而尚歌舞。”^⑩新城县(今黎川县)则坟地之争剧烈,因为当地信阴阳家言,讲风水,“葬惑阴阳家言,至于有地不葬,有葬无日,停厝近郊或至数十年,甚者至于数世,及其择地不效仍归祖塋,塋狭不容棺则易用小槽,其或侵迫谋占诱卖盗墓,辄起争讼,焚骸穿地所不忍言,虽千万中一二,然渐不可长。”^⑪饶州府“或拘形家言,至停厝之久,且致争讼,亦不能

① [宋]沈括著,诸雨辰译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565页。

② [宋]马令、[宋]陆游:《南唐书两种》,《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275页。

③ 关于历史上江西人“好讼”,有一些研究,可参见施由明《宋代江西的好讼之风》,《文史知识》2018年第1期;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江西“好讼”现象与社会转型——基于条例的考察》,《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

④ 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六《风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3册,第843页。

⑤ 同上。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页。

⑦ 光绪《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风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1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下同),第90页。

⑧ 同治《南康府志》卷四《地理·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8号》,第84页。

⑨ 同治《南安府志》卷之六《疆域·附土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68号》,第145页。

⑩ 民国《南昌县志》卷五十六《风土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3号》,第1645页。

⑪ 同治《新城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6号》,第168页。

尽去佛事。”^①这种坟地之争讼,在清代江西案例较多,且往往演变成宗族间的较量。

二、清代江西人争讼的新特点是祠产成争讼之资

在古代,争讼的原因主要有地权之争、坟地之争、财产之争、男女之奸情、命案等。争讼之资主要取自于个人或家庭,但到清代,由于江西基层社会宗族化,宗族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如赣州府“诸邑大姓,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必有祭,祭或以二分,或以清明,或以冬至,长幼毕集,亲疏秩然,反(返)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②再如抚州府的宜黄县:“宗族必有祖祠,族繁者各有房祖祠,大族多至数十,规模必宏整,过于第宅,各有祀产。元旦子姓必至祠拜祖,孩提均至,按丁给鳌饼,清明自始迁祖以下次序举祭,推尊爵或年高者主祀,与祭绅士及六十以上老人均得受胙。宗谱每届二三十年必修,每岁六月六日至祠晒谱,冬至亦举祭,较清明稍杀。”^③

正因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必有产,族产除了用于祭祀、助学、奖学、抚孤寡贫穷等外,一些宗族中人取族中公产(祠产)去打官司(争讼),争讼因此有了资金来源。

在清代,正是由于用族产争讼,加剧了社会的争讼之风,使宗族间的较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清代道光年间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汇编的《西江政要》中的《议详选立族正,给予委牌,族中小事治以家法,祠内公项止许祭祀修祠之用,如有盈余,将族中鰥寡孤独残废穷苦之人,量为周恤,不准将祠内公项作讼费章程》一文记载:

会详称,为详举族正以广教化事,道光三年九月初六日,奉宪台札开,照得本部院同,江西民间多聚族而居,各族均立祠堂,每祠俱有公费,以为族中祭祖修祠等项之用,原属敬宗收族美意,却因习染渐漓,每有族中讼事,均取给于公费,出告者恃有公费可以挥霍,妄兴雀鼠之争,扛帮者恃有公费可以侵渔,故作拖延之计,甚至有恃众械斗,以族欺弱,或因公项侵用过多,不能销冥所告之事,屡结屡翻,不愿完结,以致狱讼日多,不特被告之人受其拖累,失业废时,即本人族中亦致身受刑责,公费竭然而后已。夫一族中鰥寡孤独残废穷苦之人所在多有,既有公费,出于周恤,岂不甚善?乃以此为险健之资,速身家之祸,何其愚耶!^④

这种用祠产争讼使讼案日益增多,在清代乾隆年间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清末依然如此。

三、清代江西地方政府依托宗族应对以祠产争讼之风

为了打压这种以祠产争讼的社会风气,江西地方政府按朝廷的要求在宗族中设立族正,所谓“族正之设,因所以清讼源而除恶习。惟是教化之是否切实,祠产之有无妄用,地方官似难于周察。”^⑤这是设立族正的本义,即以宗族之有威望者约束族人、教化族人,然而,仅仅靠族正还是难以杜绝用族产争讼,争讼之风仍然不减,江西的地方官员又令各宗族公举祠正,其职责是重点管理各族祠产,“各属民祠均有祠产,往往作为讼费,饬令公举祠正,以理经费而资劝化等。”^⑥

清代江西的地方政府按朝廷的要求,在雍、乾年间,在宗族中设置了族正,即将宗族的管理政权化,

① 同治《饶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5号》,第500页。

② 同治《赣州府志》卷十二《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0号》,第417页。

③ 道光《宜黄县志》卷十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1号》,第121页。

④ 清道光年间江西按察使司编:《西江政要》,第27-31页,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⑤ 清道光年间江西按察使司编:《西江政要》,第96页,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⑥ 清道光年间江西按察使司编:《西江政要》,第98页,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官方给予宗族中某些有威望的族尊们权力,让他们以官方为背景或依靠管理族人,阻止族人们以祠产争讼,让祠产真正用于祭祖、恤孤寡、助学等族中公事,所以从乾隆直至道光年间,族正又称为祠正,就是突显其管理祠产的职责。

族正制从雍正四年(1726)设置,经雍、乾之际和乾隆前期的江西地方官凌燾、陈宏谋等的大力推行,对压制以祠产争讼暂时起到一些作用。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胡宝琮任江西巡抚,比较有力地推行族正制,“令族正约束族属,留心劝讲,俾咸知大义”^①,一年后,诉讼减少了,社会风气也有所好转。但这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大多数族正都会严控族人用祠产诉讼,刁顽之民也不是族正就能管得住的。乾隆二十八年明德上任江西巡抚时,乾隆皇帝在其奏折中硃批,告诫他要小心,江西是一个民风刁顽之地。这说明尽管从雍正四年始推行族正制,经过30多年,直到乾隆二十八年,江西讼风盛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变。

明德在乾隆二十八年上任江西巡抚后,考察了江西社会,其结论是:“江西民风大抵巧诈好讼,情伪百出,而士民惑于风水,争占坟山,迁棺盗墓,因而滋生事端,比比皆然,且奸盗诈伪之事,更所时有。”并认为江西讼案繁多的原因有地方官惰政及判案不公正等原因,但最根本是江西聚族而居,合族建祠,祠必有产,于是族中之人“每以风影之事,妄启讼端,藉称合族公事,开销祠费。县讼不胜,即赴府翻,府审批结,又赴省控。何处控诉,即往何处祠堂,用何处祠费。”^②这是因为同府、同省之同姓联宗建祠,形成一个全省之同姓联宗系统。明德在江西时间短,他只是尽力批结了积压案件,为“息讼安民”做了点事。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辅德继任江西巡抚,他发现江西社会存在的大问题仍然是长久以来存在的健讼的问题,而且到了乾隆年间,江西人特别喜欢联宗建祠,纠集同府、同省之同姓,在府省建公祠,置祠产,从而大事小事动辄以祠产争讼,同姓公祠成为“聚讼之地”,甚至“窝盗窝匪,无所不有”^③。这说明从雍正四年以来一直在推行的族正族约制没有起到根本的效果,特别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宗族势力越来越大,宗族的分支越来越多,各族建祠及同姓联宗建祠之风越加盛行。据辅德的调查,当时全省联宗建的祠堂有89祠,各族自建的祠堂有8994祠,设有荒远不经之木主的祠堂170祠,族谱中记有荒远不经之始祖的族谱1016姓。公祠141处^④。“凡属同姓者,皆得出费与祠”“每祠牌位,动以千计”“出钱者联秦越为一家,不出钱者置亲支于局外”^⑤。所以,这些联宗的宗祠祠产更多。乾隆皇帝在看了辅德的奏折之后,深有感触地批道:“妄联姓氏,创立公祠,其始不过借以醮贻渔,其后驯至聚匪藏奸,流弊无所底止,恐不独江西一省为然。”所以,乾隆皇帝要求地方大吏们:“自应体察制防,以惩弊习……各督抚等,其饬留心稽查,实力整顿。所辖之地,如有藉端建立府省公祠,纠合非类,健讼扰民,如江西恶俗者,一体严行禁治,以维风纪而正人心。”^⑥

辅德意欲从根本上根除祠产争讼之风,所以,他采取了较之前任江西地方大员更极端、更严厉的办法,这就是“毁祠追谱”,即“拆毁祠宇,收取谱牒”。辅德规定全省各地:

同姓共建祠内所设木主概令各自撤毁,所置田产及其祠屋均令自行觅售,将价各自分回,间有别无售出者,听其归于一族,或改民房铺面,或作考试寓所,及堆贮货物之用,……公宇亦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3辑,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江西巡抚胡宝琮,奏报整饬江西士习务俾永道法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9辑,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江西巡抚明德,奏陈民风吏治之情形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兼提督辅德,奏为查禁祠宇流弊涤讼源以维风教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④ 同上。

⑤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兼提督辅德,奏为查禁祠宇流弊涤讼源以维风教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⑥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0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清实录》1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17-918页。

照此办理。

荒远不经之木主及图像、匾联悉行撤毁。

所有谱首谱序荒远不经之始祖及字样名目,一概划削,并毁其板。

以始迁该地及其世系分明者,为始祖,均令行扣正送官,铃印发行。

遇有争讼,以印谱为凭,并据各属禀称,当传该族面谕,时将其僭妄荒唐之处逐一指明。

各专祠有祠产者,计6739处,除仅敷祭享外,其有余者760处,皆取具遵依,为教养子弟、留助族中贫乏婚丧之用,不得以为讼费。^①

乾隆皇帝非常赞赏辅德所采取的措施,在其奏折中朱批“好”。辅德所采取的高压措施也确实起到了效果,其继任者吴绍诗在奏折中说:“上年(乾隆三十一年),臣衙门放告之期,每期收词数十张,今年止十余张不等,健讼之风似稍少息。聚讼械斗之案,江西每年叠见,今岁并无积案。”^②然而,这种状况也就保持两三年,从朱批奏折可知,从乾隆三十三年之后的江西宗族械斗和以祠产争讼之风依然如故,直到清中后期的道光年间,江西的地方官员依然因为讼风之重而苦恼。从江西省图书馆藏江西提刑按察使编道光三四五年《西江政要》可知,道光年间的江西官员们别无他法,仍然搬出乾隆初年凌燾、陈宏谋等所极力推行的族正制(亦称祠正制),强调推行族正制的理由仍是当年凌燾、陈宏谋等人所说的那些缘由;族正制的推行法,仍然是照搬当年陈宏谋等人以“委牌式”规定族正的职责,由地方官制作“委牌”,让族正领受,官方给予族正约束族人的权力,也即让族正明确地以官方作依靠去管束族人,“委牌”上清楚地写明族正的职责:

一 宣讲圣谕以兴教化。每逢祭祀聚集之时,于公祠内会同族长、房长,传集合族子弟、分别尊卑,拱立两旁,将《上谕十六条》句解字释,高声曲吟,并将《律例》罪名及条教告示,随时讲读,实力劝导,俾尔族姓黔首心领神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敦族睦姻,以成仁厚之俗。

一 祠内公项,止许作祭祀修祠等项之用。如有盈余,均给族中鳏寡孤独、残疾穷苦之人,或穷人生女不能养育者,均给谷钱,令本妇自养,或给邻妇代养。其族中有与他族寻衅构讼者,该族正应即查禁,不得将祠内公项取作兴讼之资,以保祠产而绵祖祀,如违,重究。

一 稽查善恶以示劝惩。一族之中,贤愚不一,如遇赋性驯良,行事谨慎,家庭和睦,职业精勤者,此系朝廷顺民,亦尔祖宗之贤明,尔当加意扶持,倍为誉助,或开具事实报官褒崇。如有不守孝分,酗祖行凶,欺孤凌寡,赌博宣淫,为盗为匪,种种不公不法之事,一有见闻,轻则会同该族属房长,将本人传至祠堂,令长跪神位之前,剖别是非,言方饬。如果认过悔罪,许其具结自新。如怙恶不悛,暴戾不遂,及所犯情罪重大,即报官惩究,慎勿瞻徇莫视,自貽咎累。

一 举报节孝以励风俗。孝子悌弟,义夫节妇,秉两间之正气,为宇宙之完人。朝廷例有褒奖,闾阎籍惟楷模,尔当留心体察,族内果有其人,即投实开具事由,报县具详请旌。

一 纠察匪类以靖地方。查私宰耕牛,造卖赌具,兴贩鸦片,贩私窝盗,奸拐么私等事,总难逃族众之耳目,族人一有干犯,刻即密举查拿,倘稍为容隐,定行一体究治。

一 劝课农桑以培本务。农桑为衣食之源,勤俭为治家之本。族中倘有游手好闲之辈,务须委曲晓喻,令其务田力农。盖荒工失业之辈,必不受父兄之教诲,即是不孝不悌之人,不但渐流污下、为匪作歹已也!防微杜渐亦应报官查究。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抚兼提督辅德,奏覆查办祠谱完竣折。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9辑,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吴绍诗,奏陈岁办事务及通属情形折。

一 排难解纷以敦任恤。族中如有祖父遗产,子孙析者,应令公平分受,不许悖争。其族中有口角争斗、买卖田土、盗砍侵葬等事,即校事处分,秉公劝释,力为剖决,令理曲者,赔礼完事。倘各执己见,不能理处,以致到官者,本官提质,即将其事之始末原委,并若前如行公处不依之处,校实查明,凭官剖断。倘或瞻顾伪徇,是非颠倒,亦分别法究。

一 婚姻为人伦之首,族中如有冯媒许配之后翻悔赖婚,及谋婆强娶者,族正与族房长以大义劝处完聚。

一 族内无子立嗣,应行通闻族房长,照《律例》先保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远房同姓之人,不许尊卑失序,如或应继之人不得于所得之亲,旌择贤能,或立亲爱,不许亲房告争,义男女婿为所得之亲喜悦者,亦得均分财产,该族正务须恪遵《律例》,分别缘情处断,不得偏私。

一 族内如有匪类嗔恨族正,举官究治,异图报复泄恶,或使妇女撒泼寻衅者,该族正举县,即加倍重处,毋少宽贷。

《上谕》一本、《抚宪告示》一本、《简明律例》一本连同“委牌”授给族正。^①

从上述“委牌”所规定的族正职责可知,江西地方政府赋予了族正许多职责,似乎将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工作都交给了族正。为了督促族正将管理和约束族人的职责落实到位,江西地方政府对族正的奖惩也作了规定:

各族正于给委之后,由该州县汇报查考,该族正果能实力教导约束有方,如一年之内族人并无违犯科条,州县给予匾额,二年道府给匾,三年两司给匾,三年以后使州县举请究台亲加奖赏,倘有怠惰徇私等事,分别斥革惩儆,另举接充,庶族正知有荣辱攸关,自必倍加奋勉,似此立法劝导,则闾阎比户在在,有司教之人时时开劝戒之语,将见仁让可兴,化行俗美,不仅革除族祠恶习已也^②。

虽然清政权对宗族中的族正有奖惩规定,但力度不大,可以肯定,有的族正会着力去履行职责,有的族正可能睁一只眼与闭一只眼,即不可能那么严厉地去管束族人,所以,争讼之风盛行的地域社会问题不可能因为族正制就得到解决,终清一朝,江西地域争讼之风始终盛行。

四、清代江西的宗族应对以祠产争讼之风

争讼可分为宗族与宗族的争讼、宗族之间族人的争讼、宗族内族人间的争讼。不管是哪一种争讼,往往都会被讼师(清代文献中常贬称为“讼棍”)挑唆,使官司难得完结,讼棍得最大利益,加之还被衙吏讹诈,往往原告和被告都家产或族产耗尽,费工费时,所谓“荡家破产”“荒工失业”,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宗族所能做的,是管理好祠产外,通过“族规”或“家规”“家训”“家戒”告诫族人,争讼的害处大,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去争讼。

清代《宜春东隅张氏族谱》卷一《家规·息争讼》是这样劝诫族人:

古者人心沕穆,风俗醇厚,训斗折衡亦堪为治。后世较长量短,情伪百出而讼狱兴焉。不知讼非美事,逞一时之小忿,辄操戈于大庭,不惟荒工失业,亦且破家荡产。幸而官长明廉,是非可以立辨。倘遇刁诈险健,祸福莫能预料,此《大易》所以有终凶之戒,而圣人以无讼为贵

① 清道光年间江西提刑按察使司编《西江政要》载道光三年十月《议详选立族正 给予委牌 族中大小事治以家法 祠内公项止许祭祀修祠之用 如有盈余 将族中鳏寡孤独残废穷苦之人量为周恤 不准将祠内公项取作讼费章程》,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② 同上。

也。近见世人不明因些小衅隙,便架虚捏诬,奴颜婢膝,叫号公堂,甚者倚财仗势,吞骗谋占,使乖弄巧,谋孽成讼,又或有尺土寸地,界连不清,听唆结构,倾囊不吝,如俗所云争荒山、卖水田,一时忿争,虽得不偿失,亦莫暇顾惜。迨事过情移,两败俱伤,始悔从前之失算也,亦已晚矣!今后族中须要平争息忿,切莫藉势图谋听唆,妄控忍气,再思毋贻后悔,倘或情理有甚不堪者,从容赴祠理明,族长以及族党晓事之人,从公处服,其在局外旁人不可面是背非,唆拔扛帮,致滋讼狱。^①

宜春东隅张氏告诫族人争讼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别外,有的“族规”或“家规”“家训”“家戒”特别提醒族人,不可逞狂健讼,不可听讼棍的唆使,其害很大。如清咸丰丙辰年(1856)重修《乐安郭氏宗谱》卷之一《家规·杜争讼》^②这样劝诫族人:

先王处奸民之不靖,制为讼狱之典,盖惟事有冤抑,自当赴有司衙门陈告申雪。倘系口角微嫌,田土细事,一经亲邻劝解,本可即时息讼,即或告官,业经审断,亦可完结,乃有健讼之徒,或因挟嫌图泄,驾捏大题,或冀耸听逞刁,诬翻图准,致案牘日纷,败家失业,莫此为甚。不思片纸误投,适受讼师之愚弄,两造角胜,徒供蠹役噬吞,始以雀角鼠牙之忿,渐成录皮灭鼻之灾,讼则终凶,忍之一时固可化有事为无事,各宜痛自猛省,切莫轻信浮言,毋听讼棍教唆,毋恃歇家之强硬,庶安居乐业,门无彪吠之惊,里鲜胥差之扰,风清气美,岂不休欤!

虽然明智的世人都知道争讼害处大,但有些宗族间的争讼是避免不了的,如争风水、争龙脉,这往往是举全族之力都是不得不去斗的。清同治丁卯年(1867)《莲塘李氏族谱》记载其宗族康熙年间与他族争龙脉,争讼多年,族产耗尽的事例。康熙戊子(当为戊辰年即1688年)年的《重修祠宇宗谱合记》中记载:“第自甲寅近灾之后,得因合族龙脉所关涉讼有年,祠产之存,寥寥无几。”^③康熙庚午(1690)年的《建祠复产并重修谱序》中也谈到:“柰甲寅白寇猖獗,兵荒荐臻,人心不古,讼狱繁兴,祠产荡费几尽。”^④正因为争讼多年,祠产耗尽,莲塘李氏深感争讼的危害,在后来修谱时的族规中特别告诫子孙们不要去争讼,其危害很大:

子孙毋好讼,数至公庭,盖告人与被人告均非善良,故曰:囹圄无善士,且费资破产,酝酿灾祸,亘古至今不爽,何必逞一时之忿,结终身不解之冤,远贻子孙必报之惨耶?况有事不干己,刁唆起灭以自取凶咎者,尤可恨也!其有应当户役,事出不得已者勿论。^⑤

这是以祠产争讼的典型案列。但少数宗族用智慧化解宗族间矛盾,值得赞许。

同治十年刊本的《乐安县志》卷二《建置·寺观》记载了一个案例:乐安东隅的胡氏与象峰的元氏争讼,胡氏是乐安的大族、名门望族,从经济实力而言,肯定胡氏更雄厚,但胡氏为善者多,为了化解争讼,主动息事宁人,胡氏族人与元氏族人商量,由胡氏出钱建一庵,作为息讼的台阶。建庵,应当是作为做好事、做善事,从而让元氏与胡氏不再争讼。庵建成后请县令方谌取名。方谌取名为“息庵”,并写了一篇《记》,说明取“息庵”之名的缘由:

息之时义大矣哉!《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居学者可以熟其艺也。《周礼》以保息养万民,是货殖者可以获其利也。《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非子牧于秦,数年而马大蕃息,是田牧者可惟息劳滋殖也。《易》随卦: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谓得安其

① 清道光十八年木活字本《宜春东隅张氏族谱》卷一《家规·息争讼》,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② 乐安郭氏宗族的“家规”“家训”见上海图书馆藏咸丰丙辰年重修《乐安郭氏宗谱》卷之一。

③ 同治丁卯年重修《莲塘李氏宗谱》卷之一,第二十二世孙邑庠生文谨撰《重修祠宇宗谱合记》,上海图书馆藏本。

④ 同治丁卯年重修《莲塘李氏宗谱》卷之一,第廿二世孙贡生如环撰《建祠复产并重修谱序》,上海图书馆藏本。

⑤ 同治丁卯年重修《莲塘李氏宗谱》卷之一,《家规引·官府》,上海图书馆藏本。

身也。《庄子》：北溟之鲲化为鹏，必以六月息调，能养其技也。息之义不一也。庵居于城，远于市，地虽一隅而群山拱列。胡氏又多好善者，使金碧其神仪，丹牖其棖桷，集比丘之定慧者，处之梵音，乍歇天籁寂然之际，试以一蒲团趺坐于琉璃灯下，山草绕身，雨花落膝，尘际俗念不自知何以息矣！胡氏果推息之义，使读者息心于艺，林耕者休息于田间，商贾畜牧者孳息百倍，安其身，养其技，邻里乡党无有以讼相干者，即以兹庵为富贵之光兆也可，息之时义大矣哉！^①

此县令方湛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就是要人们把心灵安静下来，潜下心来，不急躁，读书者会有所成，货殖者可获利，农耕者可收获，争讼者可自然平息。庵可念佛息心，乡党间便可无讼。所以，胡氏建庵以息讼，这是乡间民人自我化解宗族间矛盾的智慧，体现了胡氏族人深厚的文化修养。

结 语

清代江西的地方政府和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都采取了措施，设法遏制日益严重的争讼之风，特别是设法遏制以祠产争讼的不良之风，毫无疑问，有一定的作用，但无奈清代人口日益增多，朝廷日益腐朽，各种社会矛盾也必然日益增多。终清一朝，江西地方社会矛盾日益激烈，作为地域社会势力集团的宗族对稳定地域社会秩序起过一定的作用，虽然宗族对地域社会秩序也有负面作用，如宗族间的械斗及宗族间以祠产争讼，但其对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是主要方面。在当代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借鉴历史的经验，引导好宗族活动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培养好新时代的“红乡绅”，让新时代的乡绅们将宗族的活动引导到有利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轨道上，这是时代的需要。

（责任编辑：李良木）

〔参 考 文 献〕

- [1] 常建华.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燾《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 (1).
- [2] 施由明. 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J]. 农业考古, 2013, (1).
- [3] 施由明. 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J]. 中国农史, 2015, (2).
- [4] 施由明. 宋代江西的好讼之风[J]. 文史知识, 2018, (1).
- [5] 刘正刚. 明成化时期江西“好讼”现象与社会转型——基于条例的考察[J]. 学术研究, 2021, (7).

^① 同治《乐安县志》卷二《建置·寺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263号》，第296页。